

中国古典文学丛考

第二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德润

责任校对：陈硕氏

中国古典文学丛考

第二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57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318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0253·031 定价3.05元

前 言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探讨其发展规律，这是我们的职责。如所周知，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也就没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对中国文学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分析，必须从准确的事实出发。我们所要求的考证，实际上就是对事实真相的调查和推理。就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它不是目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由于中国古典文学浩如烟海，尽管前人在考证上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留待我们及后人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很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自己的力所能及，在这方面写了一些文章，为了在同行之间从事交流，现予结集出版。同时，考虑到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可以作他山之玉者不在少数，在此一集子中收入了两篇译文。我们计划，今后能每年编辑这样的—一个集子。

收在本集中的中国论文的作者和外国论文的译者，都是复旦大学的师生和校友。

我们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录

曹丕文气说考·····杨 明(1)

韦应物集版本源流考·····李 庆(12)

《纂异记》和卢仝的生卒年·····黄永年(35)

《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陈尚君(45)

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诗文拾遗·····来 云(109)

高启诗文系年补正·····陈建华(147)

重论《西游记》的简本·····黄永年(226)

《四声猿》写作年代考·····骆玉明(253)

《金瓶梅》流变零拾·····黄 霖(264)

李渔生平考略·····袁震宇(279)

《无声戏》与刘正宗、张缙彦案·····江巨荣(316)

围绕着元本《西游记》的问题

——《西游证道书》所载虞集撰的

“原序”及丘处机的传记

·····[日] 矶部彰著 赵博源译吴明校(343)

《平妖传》之形成·····[美]韩 南著 马美信译(369)

曹丕文气说考

杨 明

以“气”论文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重要内容,《与吴质书》也以“气”评论作家,对于后世影响很大。但曹丕语焉不详,因此究竟应如何理解他所说的“气”,至今众说纷纭。例如,曹丕为什么会用“气”来评述作家作品、“气”到底是就作家而言还是就作品而言、“气之清浊有体”如何解释等问题,都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拟着重征引曹丕以前以及曹丕同时代人使用“气”这一概念的例子,加以比较归纳,这样或许有助于对《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的理解。

以“气”论文固然始于曹丕,但这决不是偶然的、突然发生的事情。先秦以来,人们早已用“气”来解释宇宙生成等等各种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现象,“气”是人们宇宙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管子·内业》说气能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庄子·知北游》也说“通天下一气耳”,都认为万物是“气”所构成。两汉魏晋时代人们继承了此种看法,提出元气剖判而生成天地、化生万物的观点。《说文解字》云:“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广雅·释天》云:“太初,气之始也,……清浊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清者为精,浊者为形也。太素,质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气相接,……剖判分离,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中和为万物。”可以代表汉魏时代人们的普遍

看法。人们认为气的作用极为广泛，所谓“天之以动，地之以静，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时五行，鬼神人民，亿兆丑类，变异吉凶，何非气然”（《潜夫论·本训》）。

人既是天地间一物，当然也与气密切攸关。用“气”来解释人体，也早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管子·心术下》云：“气者，身之充也。”《庄子·知北游》认为生命即是气，气聚而为生，散而为死。《吕氏春秋》则用气来解释人体的病理现象。在汉代，气的观念已应用于医学理论。这些都还是用气来说明人的生理现象的，所说人体之气可以认为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而在古人看来，人的心理、意识、性格、才能等精神方面的因素，是与其生理状态密切相关的。他们感到了物质性的东西与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相互转化，但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他们还不能对此作出十分合理的解释，甚至有时混淆了物质与精神的界线。例如《管子·心术下》说：“气者，身之充也。……充不美，则心不得。”意谓若充实于身体的气邪恶不美，则心思昏乱，不得其所。《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产之言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指阴、阳、风、雨、晦、明）。”认为人的情感生于自然界的气。于是“气”又被用来解释精神方面的现象。例如孟子“养气”之说中的“气”，便是指基于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正义性、合理性的坚定自信而产生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又《荀子·修身》提出“治气养心”之说：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僇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悒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

既然荀子用“治气”来概括以下诸项，可见他认为“血气刚强”、“知虑渐深”等性格、品质特征都与气有关。汉人便明确地说，人的品质等等均由禀受的气所决定。《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言人性，说

人兼有“仁”“贪”二气，故有仁、贪之性。王充则说禀“天气”多者，便是道德纯厚的圣贤；禀“天气”少者，便是不肖之人；禀“仁气”薄者，则残忍暴戾；禀“勇气”厚者，则猛烈而无义。他还认为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才能，之所以有贫富贵贱之别，也都是由于禀气不同所致。（见《论衡·自然》、《吉验》、《命义》等篇）王充已明确提出人所禀受的气有种种不同。这实在是汉人普遍的看法。汉代人还用土地之气来解释各地人民性质风气之不同。《淮南子·地形训》已有“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之说。《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至李巡注《尔雅》，便系统地用九州之气不同来说明各地人民的性质差异。（见《尔雅·释地》邢昺疏引及《公羊传》庄公十年疏引）汉末魏初任昉的《道论》又用五行之气解释人们气质的多样性：“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躁，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

“气”既被用来一般地说明人体的生理以至精神现象，那么很自然地，在评价、称道具体人物时，也就使用了“气”这一概念。现枚举汉末、三国时代以“气”说明人的气质、才能的若干例子如下：

（扬雄）受气纯和，韬真含道，通敏睿达，钩深致远，建立《玄经》，……与圣人同趣。（陆绩《述玄》）

（胡根）应气淑灵，实有令仪，而气如莹。（蔡邕《童幼胡根碑》）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后汉书·申屠蟠传》载蔡邕语）

（徐干）含元休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论序》）

（严隐）禀气清纯。（蔡洪《与刺史周俊书》）

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曹丕《周成汉昭论》）

（孙虑）气志休懿。（孙权《诏孙虑假节开府治半州》）

(魏元丕)禀乾气之纯懿。(佚名《凉州刺史魏元丕碑》)

以上诸例所谓纯和之气、淑灵之气、玄妙之气、清明之气、休懿之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唯不世之主,……有坚刚不移之气。(仲长统《昌言》)

无乃李广之气,循发益怒,乐一当单于以尽余愤乎。(孔融《遗张紘书》)

(毋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张既《表毋丘兴》)

(龚德绪、王义强)志壮气刚。(杨戏《季汉辅臣赞》)

霍光怀沈勇之气。(嵇康《明胆论》)

(徐邈)才博气猛。(《三国志·魏书·徐邈传》载卢钦所著书)

以上所谓坚刚之气、忠烈之气、沈勇之气、猛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坚定果敢的品质或性格。其他如《列异传》记蒋济儿托梦事,云“侯(指蒋济)气强,难感悟”,指蒋济性格固执。(《孔子家语·好生》:“孔子谓子路曰:君子而强气,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气,则刑戮荐臻。”“强气”亦指性格执拗。)又杨戏《季汉辅臣赞》称庞士元“军师美至,雅气皦皦”,系赞美人物高雅美好的风范。又韦昭等《吴书》称虞翻“少好学,有高气”,指超迈不群的性格。还有,刘桢称孔融“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文心雕龙·风骨》引),认为孔融长于为文是由于他禀有异于常人的“气”的缘故。刘桢以为“气”能决定人的写作才能。伏羲《与阮籍书》:“或谓吾子英才秀发,邈与世玄,而经纬之气有蹇缺矣。”“若居其劳而不知病其事,则经纬之气乏矣。”“经纬之气”当包括处理实际事务的资质、才能。《三国志·任城王传》:“任城王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将领之气”指担任将领的资质、才能。(嵇康《明胆论》说:“明、胆异气,不能相生。”认为人的见识判断能力和决断能力是分别禀受了不同的气而产生的,“气”亦包含能力而言。)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知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便已用“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也用来说明人体。说明人体时,既有从物质、

生理角度加以说明的，也有偏于从精神方面说明的。到了汉代，用“气”解释人的品格、气质、才能的说法更为广泛、普遍。至汉末三国时代，在评价、称述具体人物时也使用“气”的概念了。此点颇为重要。不难看出，《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用“气”评述作家与此关系密切。至于当时评述人物时所用的“气”的具体内容，是相当宽泛的，可以指道德品质、性格、智慧、才能等各个方面。

此外还有用“气”来说明、形容“乐”的。先秦、汉代典籍中言及乐的作用和影响时，常常说乐对人体之气甚至天地之气发生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用“气”来说明乐的本身。《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论乐的诸种因素，其一即为“气”。《礼记·乐记》说先王制乐，“合生气之和”，是说乐包含了天地间阴阳之和气。又说：“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阳、阴、刚气、柔气均指乐的声律节奏而言（据《礼记·训纂》引方苞说）。又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乐气”、“气盛”都是以气言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三者，志、声、容也。乐气，诗、歌、舞也。”）郑玄还认为不同的乐歌便有不同的气，它们各各适合于不同性质的听者。（《乐记》：“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郑注：“声歌各有宜，气顺性也。”）东汉边让《章华赋》有“音气发于丝竹”之语。曹丕也曾用“清气”一语称赞乐声、歌声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长笛吐清气。”又云：“有美一人，……善为乐方。哀絃微妙，清气含芳。”又曹植《赠丁廙》云：“秦筝发清气。”其“气”兼指秦地土地人民之“气”和乐声之“气”。为什么以“气”言乐？可能因为乐与律的关系极为密切。演奏音乐必须用律管来调整音声，使之和谐。而古人认为十二律与天地阴阳之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又歌唱发声还与人体之气有关。而古代诗、歌、舞往往合为一体，因此所谓“乐气”，可以理解为是就这三者的统一体而言的，上引《史记正义》正作此解。它既包含音声的宫商节奏，也还可以包含诗歌在内。因此“乐气”与诗文之“气”不是毫无关系的。

还有以“气”形容言辞的。《论语·泰伯》云：“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后来《韩诗外传》卷九有“辞气甚隘”、“辞气鄙俗”之语。《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载周昭称张承“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睿睿，罔不惟忠”。同传又称张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三国志·魏书·臧洪传》又言臧洪盟誓“辞气慷慨，涕泣横下”。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睿睿”、“壮厉”、“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辞的风格，这风格是由所说的内容和语气、态度等合成的给予听者的一种总的印象。与“辞气”相近的还有“声气”一语。东汉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称张衡“声气芬芳”，是指其谈吐优雅。又孔融称张衡“飞辩骋辞，溢气盆涌”（《荐张衡表》），也是就听者所获得的总印象而言，是指谈论时滔滔不绝、应对不穷，有才智横溢、所向无敌之概。用“气”形容言辞，与用“气”形容文章，可以说是相当接近的。此外，《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还曾指出，可由人们言语声音之异，从而辨别其所禀之气的不同。其言曰：“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斯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好。”这就触及到人的言辞与其性格、气质（“心气”）之间的联系，是颇值得注意的。

综上所述，在曹丕的时代，人们用“气”来评述人物，还用“气”说明与文有关的乐和言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曹丕又进而用“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以“气”评述作家。人们用“气”评述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宽泛，是指人物、乐或言辞给人的一种总的印象、感受。曹丕以“气”论文时，也是指文章总的风貌、给读者的总的印象，近似于今日所谓风格。当曹丕说某作家具有一种气时，当然是就其作品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在他看来，“文气”与作者的气质给人的感受是一致的，都可以用某种简括的词语予以概括。注意到文章的个人风格，并感觉到此种风格与作家气质之间具有联系，这是曹丕论文超出前人之处。这与下列两种情况有关：一是建安时代的文学创作注重抒写作者的个人情感，因而可能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个性色彩；二是汉末以来人物评

论风气盛行，因而人物的个性特点、独特风范受到了较多的注意。另外，曹丕以“气”论文也包含用“气”来解释作家创作才能的内容。关于此点下文再详论。总之，《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所谓“气”，兼指作品风貌和作家才性两方面，它与当时流行的关于才性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与曹丕同时的刘邵，写作了探讨人物才性的专书《人物志》。魏代傅嘏、李丰、钟会、王广集中讨论了才性的同异离合问题。其时袁孝尼亦著《才性论》，明确地以“气”解释才性的美恶。曹丕以“气”论文，正是当时盛行的才性问题的探讨在文学领域的反映。

现在先对曹丕以“气”论作家的话略加诠释：

“徐干时有齐气。”李善认为“齐气”指“文体舒缓”而言。有的研究者表示怀疑，或以为“齐”字是訛字，或以为“齐气”别有解释，并非文体舒缓之意。我们认为李善所注不误。因为上文已说明，汉人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即某地人民的质性系由该处土地之“气”所决定。汉人又观察到齐地人民风气舒缓，关于此点，研究者已举出过不少例子。徐干正是齐人。因此曹丕之意当是说徐干文章风格时有舒缓之累，而这正是作者性格的表现。《汉书·地理志》说：“其（指齐）土舒缓阔达而足智。”又说：“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嶻之间兮。又曰：爰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实际上已将土地之气、人民之性、文章之体三者联系起来。所举齐诗多用虚词而语气舒缓，但那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并非说凡舒缓之体都是多用虚词的。曹丕说徐干“时有齐气”，也是就其总的风格舒缓而言，并不是说他多用虚词。

“孔融体气高妙”。这里“体气”也就是“气质”的意思。如《论衡·无形》：“体气与形骸相抱”，可见“体气”在内，“形骸”在外，二者相对而言，“体气”即“形骸”内包含的“气”。嵇康《养生论》：“（君子）体气和平。”姚信《士纬》：“陈仲举体气高烈。”（《世说新语·品藻》注引）“体气”都是“气”的意思。所谓“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与刘楨所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意思

相近，谓孔融有度越常人之气，故其为文章，亦为他人所不可及。这里的“气”，兼指孔融的才性和其文章的高妙风格而言。

“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逸气，指不受拘束、俊逸奔放的风格。“未遒”，大约曹丕认为刘桢诗文还不够遒紧有力。

王粲“体弱，不足起其文”。上文说“体气”即“气”；若单言“体”或言“体质”、“体性”也往往是指气质、性格而言，与单言“气”意思相近。如杨修《答曹植书》说曹植“体通性达”，“体通”、“性达”意思相近，都指资质聪慧，明达事理。又如《孔子家语·好生》：“介冑执戈者，无退懦之气，非体纯猛，服使然也。”体猛即有猛气。又薛综《让选曹尚书表荐顾谭》：“谭心精体密。”（《三国志·吴书·顾谭传》）“体密”，谓性格缜密。又华覈《表荐陆祗》：“祗体质方刚。”（同上《陆凯传》）张揖《上广雅表》：“臣揖体质蒙蔽。”“体质”均指性气而言。《文选》李善注也说：“气弱谓之体弱。”“体弱”即禀气弱少之意，指文章风格不够生气蓬勃、强健有力。（《论衡·儒增》：“气乃力也。”）“不足起其文”，言文采斐然，而生气、劲健则不足。《文心雕龙·章表》有“气扬采飞”之语，文气盛壮辞采方能飞动；反之，“气弱”则不足以使其文采飞动了。后来钟嵘《诗品》称王粲“文秀质羸”，也正与曹丕的意思相近。

从曹丕的批评徐干“时有齐气”和王粲“体弱”、应玚“不壮”以及赞美刘桢“壮”、“有逸气”看来，他崇尚的是壮大有力的风格。建安时代的作者，由于感念世乱，渴望建功立业，故其作品激情迥荡，大多慷慨任气，劲健有力。曹丕的好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创作状况有密切关系。

《典论·论文》又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对此诸家的解释也颇有歧异。南朝时，陆厥《答沈约书》以为这是指音律的清浊而言，其说不确。现代有的研究者认为其意思是指人们禀气有清浊，故而才性亦有昏明，作文因之亦有精粗高卑。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清浊之气即是阳刚阴柔两种对立的风格。我们以为，其中前者的说法是允当的。因为《典论·论文》紧接着“不可力强而致”

句便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很明显，“气之清浊”是与“巧拙”连在一起的。

我们还可以从汉魏六朝人关于人的气质才性的议论里找到一些旁证。凡言人性、体气，常以清者为贵。如《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淮南子·俶真训》：“人神易浊而难清。”《春秋繁露·通国身》也说：“气之清者为精，……治身者以积精为宝。”同书《天地之行》又说：“一国之君，……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浊，若身之贵目而贱足也。”《论衡·本性》：“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浊而眸子眊。人生目辄眊瞭，眊瞭禀之于天，不同气也。”意谓心之清浊，与自天禀受的气有关。王充这种说法可能影响颇大，因为晋人欧阳建《言尽意论》提到“蒋公(济)之论眸子，钟(会)、傅(嘏)之言才性”，可知观察眸子，是汉魏时识鉴人物的内容之一。又郗炎诗云：“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将贤愚与自天禀受的性之清浊相联系。又上文所引《中论序》，称徐干“含元休清明之气”。又刘邵《人物志》讲到人体之气时，说过“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气而不清则越”(《九征》，按“越”恐是越礼，无轨检之意)，又说“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八观》)，都以气清为美。十六国时刘昉注《人物志》，又有“质浊气暗，终老无成”之语(见《七缪》注)。魏晋时袁孝尼《才性论》更明确而概括地说：“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以气之清浊解释万物的美恶，自然包括人性在内，其说与《典论·论文》所说尤为接近。葛洪《抱朴子·尚博》云：“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又《辞义》：“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都是以清浊解释文才的高下。虽然其清浊就“才”而言，未直接说清浊之气，但显然认为才之清浊来源于所禀之气。又汉人以五行配合人的五德，如《礼记·中庸》郑注有“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之语。而晋人则进一步联系到气的清浊。《搜神记》云：“天有五气，万物化成。

木清则仁，火清则礼，金清则义，水清则智，土清则思。五气尽纯，圣德备也。木浊则弱，火浊则淫，金浊则暴，水浊则贪，土浊则顽。五气尽浊，民之下也。”刘宋时顾愿作《定命论》，说人们“生之资气，清浊异源”，“故有邪正昏明之差”。（《宋书·顾凯之传》）孔颖达《礼记正义》多反映南北朝经师观点，其序云：“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醪，感阴阳而迁变。”又《中庸正义》：“但感五行，在人为五常。得其清气备者则为圣人，得其浊气简者则为愚人。降圣以下，愚人以上，所禀或多或少，不可言人，故分为九等。”由上举诸例看来，凡言人所禀之气、言人性，则以清为美，以浊为恶，乃是汉魏六朝时代人们非常普遍的看法。曹丕说“气之清浊有体”，当也是就作者的禀受而言。禀清气者才性清明，为文便爽朗动人；禀浊气者才性暗昧，为文亦暗劣低下。作者之气有清浊，则所作文章之气亦有清浊。后人论文，每以清者为美，浊者为恶，大约与气之清浊的观点有关。如陆机《文赋》言及推陈出新时说：“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钟嵘《诗品》序云：“辨彰清浊，掎摭利病。”萧纲《与湘东王书》云：“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至于刘熙载《艺概》说“气有清浊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诗家泛言气格，未是”，直接用气之清浊论文，显然应是从《典论·论文》而来。

以上引诸例还可以看到，当时人说到体气清浊，一般都认为是自然禀受，非关人力。清浊之气既禀于自然，那么所作文章的美恶也主要取决于天才，所以说“不可力强而致”。当时人崇尚自然，凡称颂人或物之美，往往归之于自然禀受。曹丕本人就说过：“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与钟繇书》）卞兰称颂曹丕“禀聪睿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孝慈发于自然”，“德生于性，明出自然”（《上赞述太子赋表》）。至于直接把善于著文归诸自然的，如王充说自己虽出于细族孤门而善于著书，其言云：“祖浊裔清，不傍（通“妨”）奇人。……扬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古（通“故”，稽故，滞留不进之意），邈出君山。更禀于元（元气），故能著文。”（《论衡·自纪》）意谓祖上虽不显赫，但子孙重新禀

受元气,所以能著文章。又说今人为文不逊于古人,因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论衡·超奇》意谓今人所禀元气与古人同,故作文亦不让古人,又如杨修称颂曹植文章出众道:“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谁能至于此乎?”(《答曹植书》)陈琳亦称曹植文才“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答东阿王牋》)。这些材料,都可供理解曹丕“不可力强而致”一语参考。曹丕对创作能力高下的解释,一方面体现了他对文章的重视,他从创作实践中认识到写文章不容易,感觉到创作活动有其难以言传的难处与妙处,不像简单的技能那样可以轻易传授,这可说是他对文学批评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还只能用带有唯心色彩思想和语言去说明创作活动,这可说是他的局限。而无论其贡献还是局限,都没有脱离其时代,都是与同时代人的观点相联系而大体一致的。

一九八三年九月

韦应物集版本源流考

李 庆

韦应物是唐代著名诗人，其“歌行清丽”，“自成一家之体”。其五言诗，尤为后人所重，故东坡有“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之句。（见宋吴聿《观林诗话》）历代《韦应物集》版刻甚多，本文拟根据所见的《韦应物集》及有关书目著录，对其版本源流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识者。

笔者所见的《韦应物集》，主要有以下十七种（民国以降的翻印本等除外）：

（一）补宋版《韦应物集》。半叶十行，行十八字。黑丝栏，左右双线边框，系陈氏书籍铺刊书棚本。现存一至四卷。“恒”、“徵”、“恨”、“朗”等字缺末笔。书中藏书印记有：“马玉堂”（白方），“古盐马氏”、“笏斋”（朱方），“周春”、“松霭藏书”（朱方）。还有陈仲鱼氏的藏书印。此书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四著录，称之为“宋刊”，且为“项氏、席氏翻雕祖本”。一九三二年，“陶风庐”曾以其影印行世。现存南京图书馆。细考此书，其中颇有残缺及后人修补痕迹。如，卷二第七、八两叶，卷四第十四叶，其字体与原刻不类，当系后人所补。又如，卷四《送别六十首》中的“六十”，《李五席送

李主簿归西台》中的“五”字等，字体疲软，显非宋人体格，殆后人修版所补。故知此书非宋印，当系修补宋版。

(二)元麻沙本《须溪先生校本韦苏州集》。每半叶十行，行十六字，字体颇软。黑丝栏，粗线边框。卷末附录刘须溪题识。文中小字，多为刘氏评语。现存六至十卷。此书与补宋版配为全帙，故藏书印记相同。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称之为“麻沙本”。

(三)影宋钞本。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前有宋沈明远所作韦氏传略，后有拾遗诗八首。卷四有王钦臣《序》，似为装订时错叶。书中有“寅昉”（朱方）、“臣光煊印”（白方）等藏书印记。原似为海宁蒋光煊藏书。

(四)明弘治九年李翰、刘玘刻本《韦苏州集》。半叶十行，行十八字。黑丝栏，上下双线边框，大黑口。墨色浅淡，刻不甚精。前有王钦臣《序》及拾遗诗八首。后有弘治丙辰杨一清跋，凡十卷，与宋本同。书中有“武林叶氏藏书记”（朱文）、“萧称印记”（白方）等藏书印记。

(五)翻刻李翰、刘玘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黑丝栏，双线边框，黑口。即一九五九年《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称“明黑口本”者。书中多残缺，如卷四仅存诗四首，卷五《答冯鲁秀才》前俱缺佚。有“琴江翁氏珍藏”（朱方）、“墨巢居士”（白方）等藏书印记。

(六)明铜活字本《韦苏州集》。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凡十卷。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列为《五十家唐人诗集》之一。

(七)明嘉靖间华云刻《韦江州集》。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凡十卷，附录一卷。《四部丛刊》即据此本影印。

(八)明嘉靖间下邳余怀刻本《韦苏州集》。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无丝栏，单线边框，白口。前有余怀撰《重刻韦苏州集序》，云：“余游吴郡，久慕凝香画戟之风流，乃汇王钦臣、葛繁、姚宽所校本，与友人金子订而刻之。”书前有一题签，系易培基氏所书，略云：“曾见明刻《韦集》数种，无有善于此者。前年居宛平，曾以宋嘉定本校